

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

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内容摘要: 拉萨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自发现以来一直引起西藏考古学者的关注, 但对于其来源问题迄今尚未有定论。此前的讨论都从欧亚视野内探讨了该铜镜产生的广阔时空背景, 肯定了其与域外文化之间的交流, 但对于铜镜本身的装饰风格多有忽视, 这直接影响了对其来源的判断。本文分析了3枚有统一艺术风格的西藏带柄铜镜的镜背装饰, 认为其与滇文化青铜器艺术风格相当接近, 大多纹样都可以在滇文化及其临近地区找到对应。同时又结合其他文化因素, 如带柄铜镜和铜铁合制兵器在滇文化中的流行, 滇文化青铜剑在西藏的远播, 以及汉式镜因素的影响等, 试图为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并由此证明西藏腹地与滇文化之间存在的文化联系。

关键词: 带柄铜镜 滇文化 铜铁合制器 西藏考古

1990年拉萨曲贡青铜时代墓葬中铁柄铜镜(图一: 1)的发现, 对于西藏考古来说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是首次在西藏地区的科学发掘中获得的一件对于西藏交通史及其与域外文化交流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证, 它使得考古学者能够满怀信心地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西藏的史前文明, 并将其置于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文化大背景中进行讨论^①。它的发现似乎加强了一些曾经模糊过的共识, 即西藏同其他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一样, 是整个欧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 西藏的远古文化不是孤立的、封闭的, 而是从很早开始便与欧亚其他地区存在着交通联系和文化交流, 虽然这样的联系和交流不一定是直接的和持续不断的。

曲贡的带柄铜镜并非在西藏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德国学者容格(N. G. Ronge)等人曾从西藏收集到一枚具有相似风格的带柄铜镜^②(图一: 2)。他指出, 类似的发现在西藏一些寺庙中还保存有一定的数量。另外一枚公布过的铜镜藏于法国^③, 据称也出自雅

① 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第650~661页;《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第61~69页;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第642~648页;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45页。

② N. G. 容格, V. 容格, H. G. 希特尔(合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9~199页。

③ Anne Chayet: Art et Archéologie du Tibet, Paris: Picard, 1994, p. 59, fig. 33.

鲁藏布江河谷(图一:3),吕红亮指出它应该是容格文中略带提及的一枚。^①从形制和纹饰来看,这三枚铜镜具有诸多类似之处:三枚镜都为带柄铜镜(其中两枚都为铁柄,另一枚柄部遗失);三枚镜都是镜背微凹,镜面略微突起,镜背中央微微隆起,周缘有一道明显的突棱,其截面呈三角形,下部有特制的基座连接镜柄;镜背装饰都是戳点为地,留白为纹,纹饰有图案性极强的勾连纹及其他数种几何纹样,装饰风格较为统一;在制作技术上,采用镂刻、琢磨和冲压等不同工艺,背面镀金为饰。这些特征都显示出与欧亚草原、新疆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带柄镜的不同之处,具有相当鲜明的地域特征,完全可以自成一组,因此可暂名之为“藏式带柄铜镜”,以期将来有更多的发现来充实丰富其文化内涵。



图一 藏式带柄铜镜

1. 曲贡出土铜镜; 2. 容格收藏铜镜; 3. 法国私人藏铜镜。

此前人们对有关此类铜镜的诸多讨论形成了一个共识,即西藏所发现的铁柄铜镜与我国新疆、云南等地所出的带柄铜镜一样,属于西方带柄铜镜系统,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至于其具体的源头,却存在诸多分歧。希特尔指出其与汉地铜镜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金属合金成分上的相似性;霍巍先生认为其与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四川等地发现的带柄铜镜关系更为密切一些,但认为在输入路线上与新疆相接的西藏西部是一个重要环节;赵慧民先生认为镜背花纹所体现的风格在斯基泰文化带柄镜中不曾见到,鸟纹类似印度古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孔雀形象,可能的来源是南亚次大陆;吕红亮根据鸟纹推测其自中亚南部或印度北部一带经西藏西部传入,同时经过了西藏本土艺术家的改造。

这些结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铜镜本身的金属成分与汉镜相似,形

^① 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藏学学刊》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制上与滇文化带柄铜镜比较接近，纹饰上与南亚次大陆接近，西藏西部是其输入路线中的中间环节。这些矛盾之处使该铜镜的来源问题变得扑朔迷离。对于三枚铜镜背部纹饰的探讨是此前讨论中的薄弱环节，而诸多关于其来源的推测却建立在这一相对脆弱的基础之上。本文尝试对镜背装饰纹样与临近地区以滇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作剖析比较，以论证其整体艺术风格特征及其所接收外部影响的途径问题。

一、藏式带柄铜镜与滇文化青铜器纹饰之关系

三枚铜镜的镜背都是以简明流畅的几何形图案作为主要装饰主题，其中勾连纹带是三者所共有的，装饰于铜镜的外区的外环，外区的内环分别为鸟纹、束辫纹和菱形纹，内区分别装饰圆圈纹及两种不同形状的涡云纹。不论从器物装饰的整体风格，还是单纯某一类装饰纹样来看，都与滇文化青铜器中所见装饰纹样有着密切的联系。滇文化青铜器上绝大部分都有几何装饰图案，有的通体有花纹，如铜鼓和铜桶、铜盆等生活用具，一般兵器和生产工具上的装饰花纹多在其柄部及釜部，常见的有弦纹、绳辫纹、菱形纹、双旋纹、云纹、网状纹及水波纹等；铜鼓及生活用具则多三角形齿纹、圆涡纹、竹节纹、斜线纹、点纹及太阳纹等。这些装饰纹样在青铜器上多交替出现或组合使用，构成器物表面变化多样的装饰图案^①。这三面铜镜的装饰纹样，都可以在这些滇文化青铜器装饰中找到大量相似的例子。

1. 勾连纹

滇文化青铜器中勾连纹相当常见，广泛分布于兵器、铜鼓、贮贝器及其他器物表面，经常与绞索纹配置，其表现为两种形式：单独的S形和连续的波浪形。根据比较可知，这种勾连纹的原型可能是蛇纹。在昆明羊甫头、晋宁石寨山和呈贡天子庙等地所出土的青铜器物中，该图案衍变的过程相当明确^②（图二）。具象的蛇纹与图案化了的勾连纹并存，但其数量并不多，大部分器物装饰以抽象的勾连纹为主，其中又以单独的S形勾连纹为主流。波浪形勾连纹数量也较多，大多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带，装饰于圆形的扣饰和铜贮贝器周缘以及铜鼓的鼓面，如呈贡天子庙出土的五牛盖贮贝器^③。其中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④鼓面上的勾连纹（图二：6）与带柄铜镜上纤细狭长的勾连纹最为接近，两者也都呈顺时针的方向环绕。

2. 变形勾连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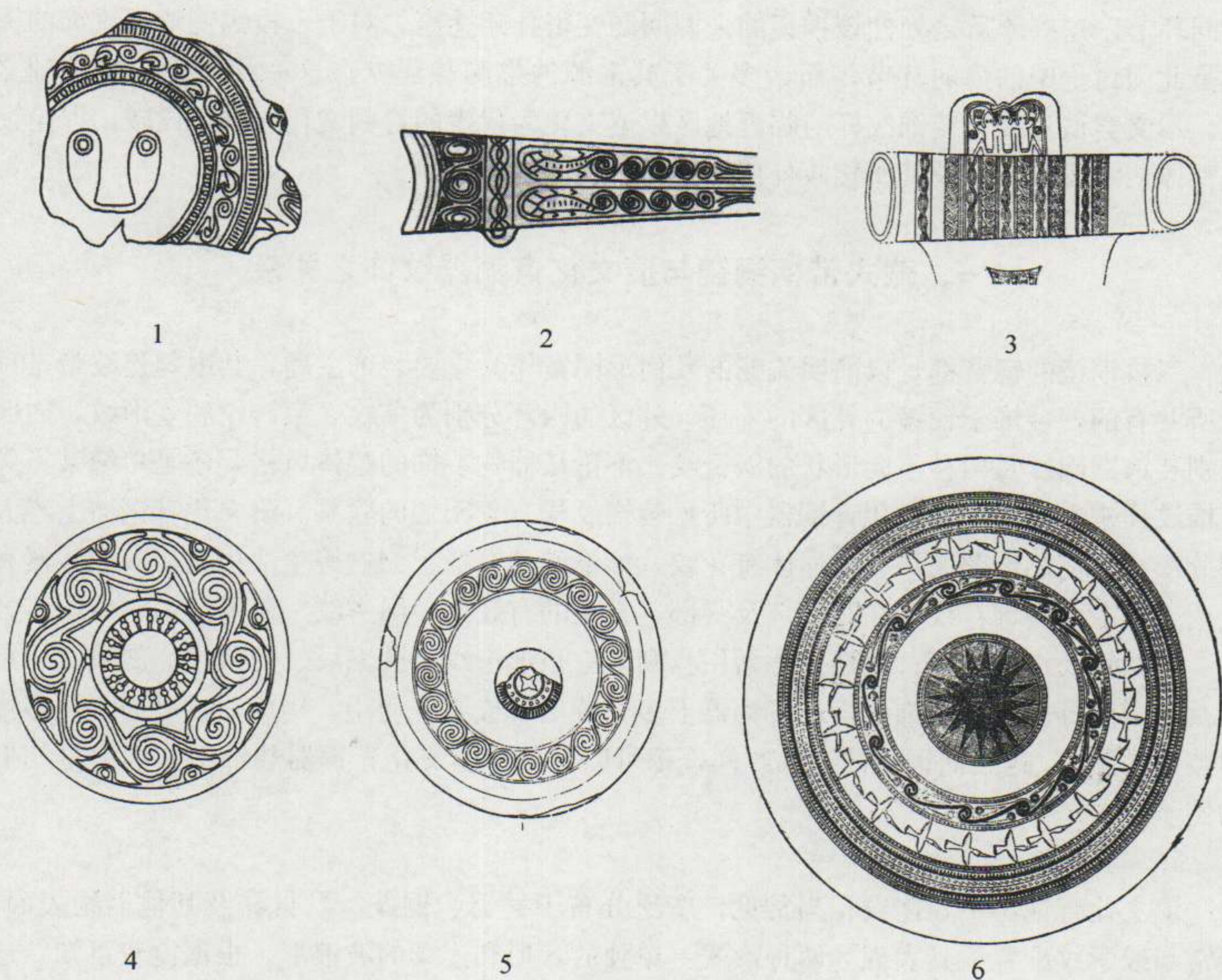
关于容格所收集的铜镜外区最外环的装饰纹样，皆描述为锯齿纹，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稍作留意可发现，它们是由呈反向的Z形折线首尾咬合在一起形成的一周图案（图三：1），在每两个相邻折线单元相接的地方都有双线交叠，因此，它们实际上是变形的连续勾连纹。这样的几何图案在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是较为罕见的，但在滇文化及其周边

①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25~226页。

②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一）》，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33页，图一一七：1-6。

③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第507~545页，图二九。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第43~51页，图二。



图二 勾连纹

1. 横大路墓地出土铜扣饰；2. 羊甫头墓地出土铜啄；3. 石寨山墓地出土铜戈；4. 老龙头墓地出土铜牌饰；5. 石寨山墓地出土铜扣饰；6. 广西西林普驮铜鼓。

相关青铜器的装饰中却屡次出现。如云南呈贡天子庙墓地 M41 贮贝器的盖部及器身装饰^① (图三: 2), 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出土铜鼓^②的鼓面装饰 (图三: 3) 等。这样独特的装饰是将西藏带柄铜镜与滇文化青铜器建立直接联系的重要证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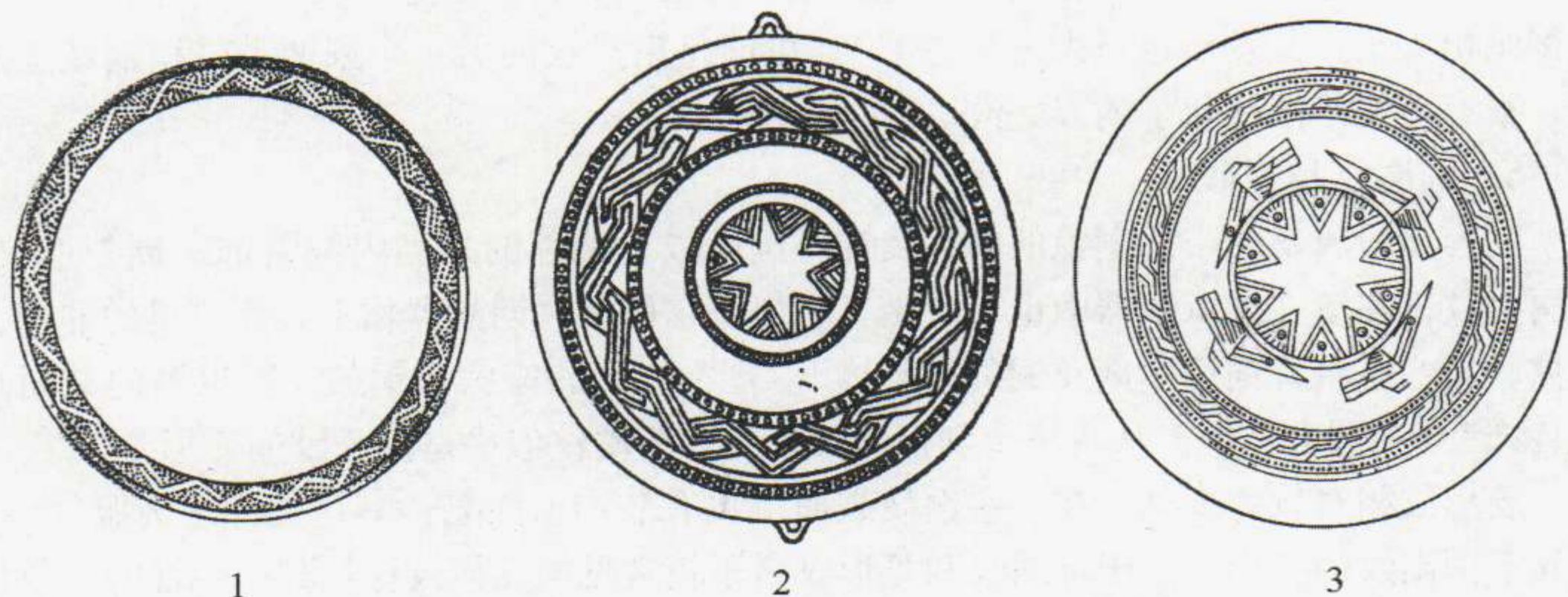
3. 涡云纹

两枚铜镜的内区装饰有涡云纹, 曲贡铜镜的涡云纹略呈菱形, 四角沿顺时针方向延伸为卷曲的涡云 (图四: 1)。该纹样还出现在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的青铜泡饰^③ (图四: 2) 上, 两者极为相似, 后者仅在每团涡云上多出一反向卷曲的触角。由于该纹饰造型独特, 两者的相似性恐怕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笔者认为它是将西藏带柄铜镜与滇文化青铜器建立直接联系的另一个重要证据。原报告称此纹饰为昆虫双角纹, 实际上, 它可能是

①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第507~545页,图一六:3。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图四:5。

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图八二:4。



图三 变形勾连纹

1. 容格收藏铜镜；2. 天子庙墓地贮贝器盖；3. 老龙头墓地出土铜鼓。

由兽面纹演变而来的一种纹样，在八塔台和横大路墓地出土的另外一些同类青铜泡饰^①（图四：3~7），显示了这一图案的变形过程，这也说明该纹饰应该是在滇文化中产生的。

容格所收集的铜镜的内区涡云纹略呈星形图案，由八个锯齿围成一圈（图五：1），由角顶出发扩展出流动的波纹，在波纹的转折处饰以圆点纹。这一纹饰在滇文化青铜器装饰中尚未发现完全相同的，但在波纹转折处饰以圆点纹的纹饰却有多例，如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铜簋^②（图五：2，3）装饰，其产生的效果与该涡云纹相对比较接近。涡云纹中心的八角星形纹饰，与大多数铜鼓鼓面的中心星形纹饰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两者的基本构图也基本接近。

4. 束辫纹

容格所收集的带柄铜镜的外区内环装饰有一圈束辫纹（图六：1），这类纹饰在滇文化青铜器中相当常见，常常与勾连纹搭配使用，装饰于青铜兵器的柄部，其中以石寨山青铜器物上出现较多，与铜镜上的装饰相同，例如晋宁石寨山青铜斧、钺的銎部，矛的骹部，戈的援部及贮贝器器身等（图六：2，3）^③。这类纹饰的原型可能为缠绕的双蛇纹，或者是人的发辫。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羊甫头等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上有大量写实的双蛇缠绕的图像^④（图六：4），装饰于器物同样的部位。而该类纹饰更具象的

^①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2页，图六六：1；第87页，图七一：2；第98页，图八二：1，3；第178页，图一四八。

^②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91页，图五九：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4页，图五三：8，9。

^③ 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31页，插图七：3；第35页，插图八；第57页，插图一一：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69页，图四三A。

^④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4页，图三二：5；第63页，图三八：2；第82页，图五一：1，2，3。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第362页，图二四：1。

形式,是一些浮雕铜扣饰的底部以双蛇缠绕,托起人、兽等主题纹样^①。此外,个别器物上刻画出人头,其发辫也呈束辫纹造型^②,可能是束辫纹的另一个来源。带柄铜镜上的纹饰,很有可能是图案化了的双蛇纹。

5. 圆圈纹和菱形纹

在容格所收集的带柄铜镜的内区装饰有圆圈纹,相邻的外区内侧装饰一周菱形纹饰。这两类纹饰在滇文化青铜器中也有应用,多出现在西汉时期的器物上,而更早的器物上不多见。如八塔台青铜扁茎剑及铜剑鞘装饰^③(图七:1),李家山铜鼓、贮贝器的鼓面及器身装饰^④等(图七:2)。从八塔台剑柄装饰来看,圆圈纹似乎是涡云纹的变形。

菱形纹相对较为少见,在一些铜鼓鼓面上也有装饰(图七:3),被称之为眼纹^⑤,可能属于圆圈纹的变形。由于圆圈纹和菱形纹属于较常见的几何纹样,其相似性的比较仅供参考。

6. 鸟纹

对于带柄铜镜上鸟纹的比较应该更加慎重些,因为动物图像在大多数不同文化中都存在,而且表现形式也都非常接近,成对出现的图像也比较普遍,不唯西亚、中亚和印度有之,楚文化及美洲古代文化也有不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类均衡对称的审美法则,不一定必然存在文化上的传播关系。况且曲贡铜镜上的鸟纹仅为图案式剪影,实际上根本无法断定其种属。两鸟篆刻于铜镜中心圆区之上稍偏向左方的位置,并没有沿铜镜的中轴线对称,在构图上具有不平衡感,很难判断其是否具有某种特定的偶像含义,个人认为其仅作为装饰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退一步来讲,纵使此对鸟可被作为图腾式的崇拜对象,在滇文化及其临近地区的青铜文化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表现,例如昆明羊甫头箭箝装饰^⑥、盐源青铜树枝形器上的对称式动物造型及对鸟形象^⑦。从构图上看,铜镜上的鸟纹装饰于多重同心圆装饰纹带之间的空白环带内,这与滇文化及其临近地区所出铜鼓的鼓面鸟纹装饰带也有共同之处。滇文化铜鼓鼓面上有大量的鸟纹(图二:6,图三:3,图七:2),多为同向飞翔,个别为相对排列。数量上也以四、八、十等偶数为主,对于其种属,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翔鹭说^⑧。

①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9页,图七〇:1—6。

②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第47页,图二四:3。

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第37页,图二八:1;第38页,图二九:1,2;第39页,图三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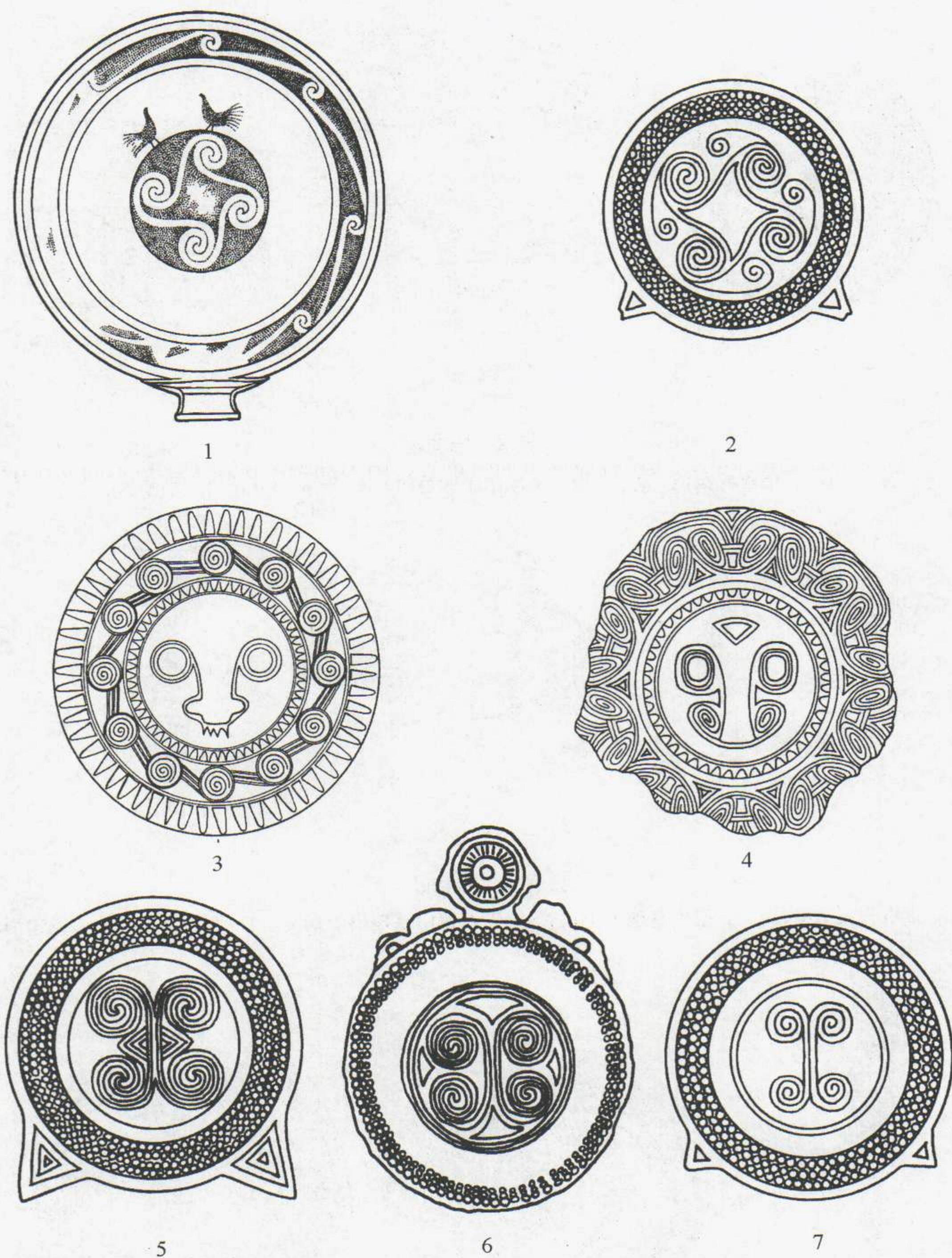
④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图七九:1,2;第126页,图八五。

⑤ 蒋廷瑜(著),吴崇基(图):《铜鼓艺术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图三九。

⑥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一)》,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97页,图一七四;第241页,图二一一:1;第242页,图二一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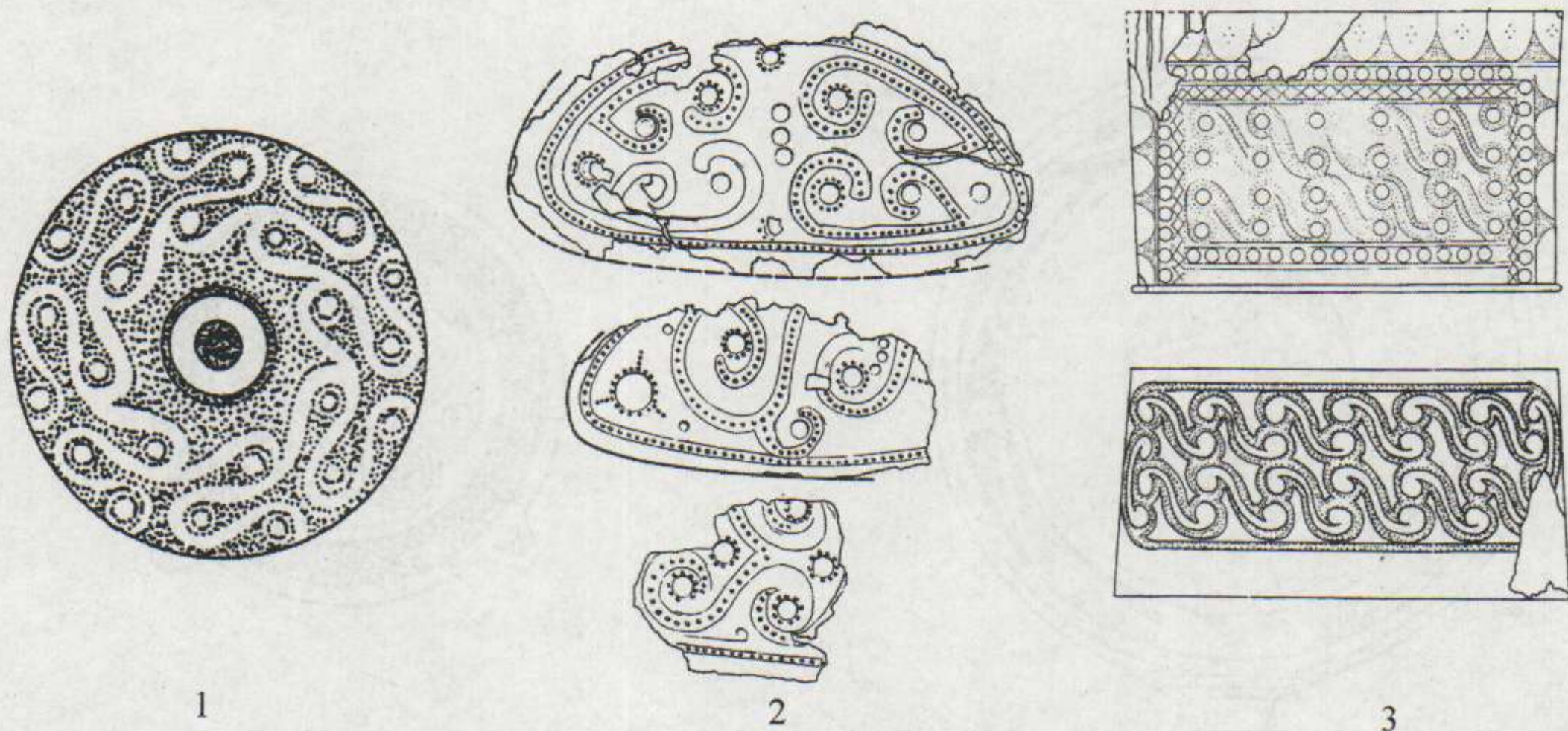
⑦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图一一四。

⑧ 冯汉骥:《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文物》1974年第1期,第51~6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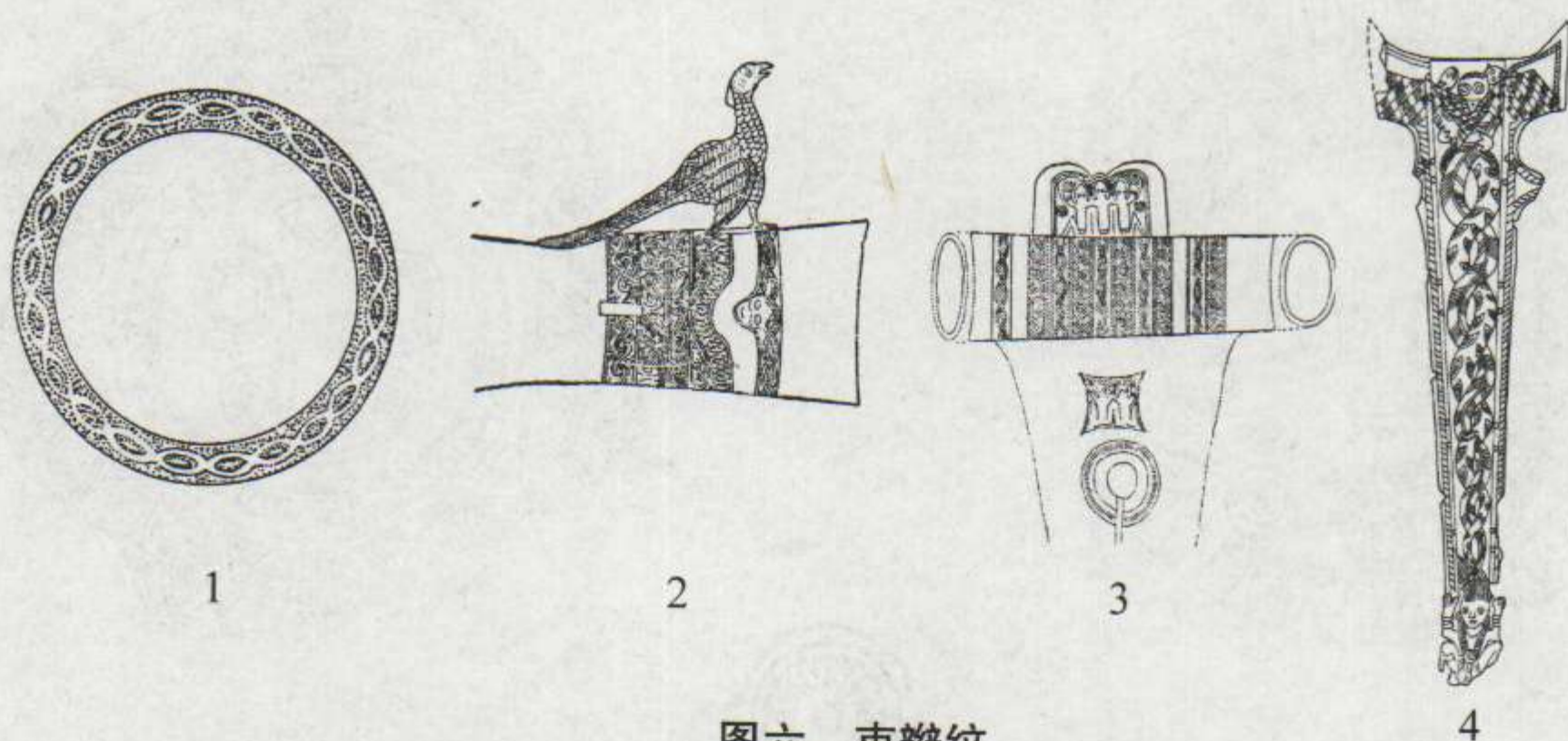
图四 涡云纹

1. 曲贡铜镜；2, 3, 4, 5, 7. 八塔台墓地出土铜扣饰；6. 横大路墓地出土铜扣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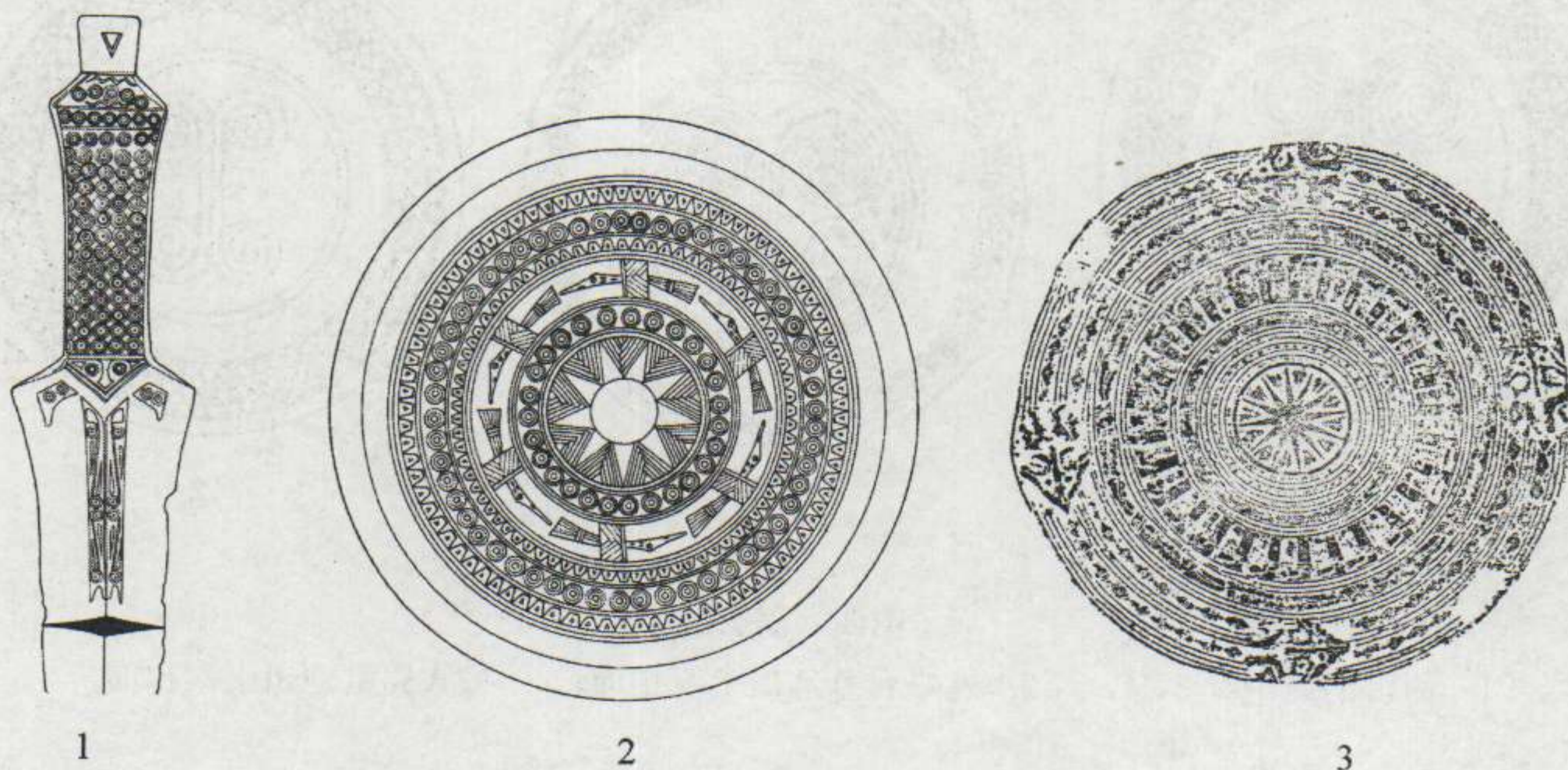
图五 涡云纹

1. 容格收藏铜镜；2. 石寨山墓地出土铜箭箝；3. 李家山墓地出土铜箭箝。



图六 束辫纹

1. 容格收藏铜镜；2. 石寨山墓地出土铜斧；3. 石寨山墓地出土铜戈；4. 李家山墓地出土铜鞘饰。



图七 圆圈纹和菱形纹

1. 八塔台墓地出土铜剑；2. 李家山墓地出土铜鼓；3. 广西冷水冲出土铜鼓。

二、藏式带柄铜镜与滇文化关系之外部证据

1. 滇文化带柄铜镜

滇文化及临近地区是带柄铜镜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①，出土地点包括德钦永芝^②、祥云检村^③、宁蒭大兴^④以及四川的盐源^⑤、茂汶^⑥、荣经^⑦等。霍巍先生通过与曲贡带柄铜镜的比较指出，从镜柄与镜背装饰而言，两者相对比较接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镜面与镜柄都是通过镜柄套座来加以连接；镜柄套座多为扁圆形或扇形；镜柄不是扁平的，或为圆形，或为方釜、圆釜形；镜背多非素面，常见装饰纹样。由此，霍巍先生认为：“西藏高原中部所发现的带柄镜，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似与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四川等地的带柄铜镜关系更为密切一些。”^⑧这是本文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根据希特尔对于容格所收集的带柄铜镜的分析，很难将该镜的产地置于汉文化影响之外。该镜镜面向外弧凸，边缘有高出镜面呈三角形的斜棱，这应该是对汉式铜镜的模仿，更为重要的是，其合金比重也与汉式镜的标准相当。而藏南谷地接触汉文化影响的最方便途径，便是通过东部的横断山区。在滇文化的中晚期阶段，即西汉时期，汉族移民和汉文化相继进入云南地区，是铜铁合制兵器及纯铁器兴起的时期，同时也出现了来自内地的“汉式器物”如百乳镜、山字纹镜、昭明镜和日光镜等^⑨。滇文化区具有发达的青铜冶金业技术，因此，在某些方面模仿汉式铜镜是相当容易的，至少也应该是混合汉式铜镜与本地带柄铜镜诸多因素的最佳地点之一。

2. 铜铁复合制品的盛行

藏式带柄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铜铁复合制品，这在过去似乎被忽视了。曲贡铁柄铜镜为先铸空心圆柱状铁柄，然后再将铜镜与铁柄合铸成型；容格所收集的带柄镜柄部遗失，根据其造型，“镜面与套座是铆合还是浇铸在一起，尚不明确”。但其文中提到，“在西藏南部一著名藏传佛教寺庙里藏有另一面同样的铜镜，只是该镜的铁柄更细更长”；至于法国私人藏的带柄铜镜，柄也为铁质，从其图片来看，应该与曲贡铜镜的铸造方法相同。三枚铜镜都为铁柄铜镜，说明它们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当时该地区所流行的款式。

铜铁复合制品是早期铁器时代产生的特殊金属器，是所谓的“前斯基泰时期”的典型文化特征之一。这类器物最早产生于地中海东部及两河流域，在伊朗和黑海地区公元前

① 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第3~8页。

②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第244~248页。

③ 云南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第33~41页。

④ 云南省文物局工作队：《云南宁蒭县大兴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226~232页。

⑤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⑥ 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墓》，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9）》，北京：文物出版社，第81~90页。

⑦ 李晓鸥，刘继铭：《四川荣经烈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第602~606页。

⑧ 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第650~661页。

⑨ 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14 到公元前 12 世纪比较常见^①。当时铁作为稀有金属,多应用于兵器的刃部,铜柄铁剑尤为盛行。在中国,商代中晚期出现陨铁与青铜的合制器物,西周晚期后人工冶铁与青铜复合制品开始增多。以河南三门峡、山西曲沃及陕西梁带村遗址为代表的铜铁合制兵器发现较为集中的豫陕晋交界地区被认为是中原冶铁技术的起源地^②。

春秋晚期到西汉时期,中国的铜铁复合兵器最普遍的器型是铜柄铁剑,其形制与西亚和黑海地区的铜柄铁剑祖型存在一定的关联,西方大多数学者认为北高加索是这类铜柄铁剑向外扩散的一个中心^③,其影响到中国很有可能是通过北高加索及欧亚草原^④。中国境内的铜柄铁剑以三叉护手剑占绝大部分,主要分布于甘肃庆阳,宁夏银川、固原地区,以及西南地区。西南地区是其分布中心,其源头可追溯到时代偏早的甘宁地区^⑤。其中以滇池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发现地点最密集,种类也最繁杂,年代大致为西汉时期。^⑥有学者认为,这些铜柄铁剑都可以在当地青铜剑中找到它们相应的形式,是在云南青铜剑的基础上直接演变而来的^⑦,可见本地的焊接工艺和加工制造铁器的技术已经非常纯熟,并且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器形和装饰风格。

滇池及其临近地区铜铁复合制品的大量存在,为铁柄铜镜在西藏境内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这一传统自东向西影响到西藏腹地是非常可能的。在发现铁器较早的新疆地区,铜铁复合制品反而则较为罕见^⑧,从这一角度上来看,藏式带柄铜镜与新疆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明显。

在铁器流行的早期,铜铁复合制品用作生活用器非常少见。滇文化已经有相当先进的冶金技术,而铁器用于装饰品则出现较晚。一般认为,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是滇池地区开始使用铁器的时期,主要用于兵器和生产工具,而生活用具较少采用。西汉中晚期,滇池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铁器,除了用于兵器和生产工具外,也用于小件生活用具^⑨,当然这一过程也有可能开始稍早,如云南祥云检村出土有铁制的手镯^⑩,被认为属于西汉早期。如果西藏的铁柄铜镜果真与滇文化密切相关,则其流行年代可能定在西汉时期较妥。

① J. C. Waldbaum, Bimetallic Objects from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Iron, in J. D. Muhly, R. Maddin, and V. Karageorghis eds., Acta of the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ymposium Early Metallurgy in Cyprus, 4000–500 BC, Larnaca, Cyprus 1–6 June 1981. Nicosia: Pierides Foundation, pp. 325–347; K. R. Maxwell-Hyslop, H. W. Hodges, A No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chnique of ‘Casting on’ as Applied to a Group of Daggers from North West Persia, IRAQ, vol. 26, No. 1, pp. 50–53.

② 陈建立等:《梁带村遗址 M27 出土铜铁复合器的制作技术》,《中国科学 E 辑:技术科学》,2009 年第 9 期,第 1574~1581 页。

③ Koryakova Ludmila N., Epimakhov Andrej V., 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93.

④ 拙文:《北高加索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 年 8 月 20~25 日,宁夏银川。

⑤ 杨建华:《三叉式护手剑与中国西部文化交流的过程》,《考古》2010 年第 4 期,第 71~78 页。

⑥ 宋世坤:《我国西南地区铜柄铁剑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 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271~278 页。

⑦ 张增祺:《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82 年第 1 期,第 60~64 页。

⑧ 陈戈:《新疆出土的早期铁器》,《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425~432 页。

⑨ 宋世坤:《我国西南地区铜柄铁剑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271~278 页。

⑩ 云南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 年第 5 期,第 33~41 页。

3. 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

1999年,西藏西部出土的一件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①,再次拉近了滇文化与西藏腹地之间的距离。该短剑出土于札达县皮央遗址的一座墓葬,其剑柄两端各有一涡状圆饼形饰,内为同心圆纹线,剑茎的格与剑首部位均装饰连珠纹连缀而成的三角形纹样,表明似原有鎏金,三角纹饰之外饰有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联珠纹。根据碳十四数据,该墓葬年代相当于中原秦汉时期。其独特的造型及装饰纹样在其他地区并不多见,却与滇文化及其临近地区发现的一类青铜短剑非常接近,霍巍先生曾对此作过非常系统深入的讨论^②。其出土地点包括云南剑川鳌凤山^③、德钦纳古^④、永胜金官^⑤和四川盐源等^⑥,其中以云南永胜县发现数量最多,其时代也在战国末到西汉,与皮央遗址的青铜短剑大致同时。毫无疑问,皮央遗址的青铜短剑应该是直接或辗转来自以滇文化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区,并保持着其出产地的原貌,似没有经过使用者的改造和加工。

鉴于出自滇文化的青铜短剑可以远播至西藏西部边境,这使我们确信,在西藏西部和东部横断山区之间的交通干线上发现任何与滇文化相关的器物或文化因素都是完全可能的。一个单件器物可以千里迢迢输入到藏西,说明当时两地之间的交通应该是畅通的。而拉萨地区正好处于这一交通线路的中间位置,它应该有更便利的条件获取来自东部青铜文化的器物及其文化影响。

上述器物都是滇文化及临近地区所具有的,它们与西藏的带柄铜镜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可以作为藏式带柄铜镜镜背装饰吸收滇文化影响的佐证。囿于目前的考古资料,关于青铜时代及早期铁器时代滇文化及其临近地区与西藏腹地的文化联系,是一个尚未引起注意的命题。除了上述所列举的诸例可揭示其端倪外,此前相关的探讨还涉及川滇西部石棺葬与青藏高原石棺葬的关系^⑦,但其间的联系至于何种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和更深入的探索。

三、结论

经分析比较可见,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镜背装饰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其纹饰构成要素在滇文化青铜器装饰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踪迹或原型,从整体上看应该属于精简模式的滇文化装饰风格,很有可能是其制作者自滇文化青铜器装饰纹样库中选

①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第14~31页。

② 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收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7~447页。

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9~265页。

④ 张新宁:《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第220~224页。

⑤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易学钟:《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总第19期,1986年。

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70页,第173页。

⑦ 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第650~661页;陈祖军:《青藏高原东部石棺墓遗存初探》,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9年10月16日~20日,北京。

取素材,或是处于其浓厚的文化背景中的工匠不自觉而为之。地缘因素及宏观的文化背景似乎也都支持这一分析。如果考虑到带柄铜镜和铜铁复合制品在滇文化中的流行,西藏带柄铜镜所携带的汉式镜因素,以及滇文化向西藏西部的渗透和影响,这一推测似乎更有可能。至少,在考虑藏式带柄铜镜的制作地时,也许更应该向东方尤其是滇文化及其临近地区去寻觅源头。考古发现证明,从战国到西汉前期,滇之青铜文化之繁盛,在中国西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罕有其匹^①,其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力,很有可能超出我们目前的认知水平。

对于三枚铜镜从别处输入的观点,考古材料本身似乎略显单薄,证据缺环相对较大。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至今,带柄铜镜即便不是孤证,也是屈指可数的可将西藏腹地与整个欧亚草原建立联系的器物之一。关于以往发现的动物风格的小件青铜器物,^②其与欧亚草原动物纹饰的联系也是不可捉摸的,不但其年代难以确定,其造型也鲜有可直接比对者。因此,即使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脆弱的和间接的,其地方特色显然会给人以最突出的印象。当然西藏腹地与其他任何有人类活动的地理单元一样,自远古以来都不是封闭的空间。因为只要有人类的活动,纯粹封闭的地区是不存在的,封闭与开通都是相对而言。正如一位西方考古学家所言,“所有的文化都处于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之中,文化的联系是一个基本的人类事实”^③。因此,笔者认为,既不能忽视西藏与整个欧亚草原之间的联系,也不能夸大了这种联系,毕竟在交通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化上的交流会以被动吸收为主要特征,而且倾向于同最临近的、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文化区相接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东部。

① 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第307~329页。

② (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图版2~32。

③ Chris Gosden, *Archaeology and Colonialism: cultural contact from 5000 B. C.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